

# 杜甫词典

王士菁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DUFU CIDIAN  
杜甫词典

王士菁 编著



NLIC2970818265

河南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词典/王士菁编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649-0408-1

I. ①杜… II. ①王… III. ①杜诗-鉴赏-词典  
IV. ①I207.2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0366 号



责任编辑 刘建吾

责任校对 刘 燊

封面设计 马 龙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前言

## ——让更多的读者读懂杜甫的诗篇

### 一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连续不断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凡是爱祖国、爱人民,和自己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为祖国人民之忧而忧,因祖国人民之乐而乐的诗人都是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他们的优秀诗篇都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唐代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诗篇更为历代众多读者所传诵。1986年,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杜诗便览》,其后1999年在巴蜀书社又出版过一本《杜诗今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普及到广大的读者中间去。可能是因为《杜诗便览》过于繁琐,而《杜诗今注》又太简略,这两本书出版以后,读者不多,未能达到普及的目的。

记得前些年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读懂鲁迅的作品,从1983年起,我曾经和众多的专家学者协作编辑过一部《鲁迅大词典》。冯文炳先生曾经多次赞扬杜甫是“我国古代的鲁迅”。“常常感到古代杜甫同现代鲁迅有相似的地方”。我认为:冯先生的意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此想到,对于杜甫和他的诗篇,也应该像对待鲁迅及其著作那样,做一些有效的普及工作,这对于一般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可能是必要的。

如今,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读懂杜甫的诗篇,在古代以及现代当代众多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我便编辑这一部《杜甫词典》。我深切盼望能够把杜甫及其诗篇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普及到广大的读者中间去。这对于创造更加辉煌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使更多的

新诗人写出更新更美的诗篇，也将起到它的应有的作用。回想在做学生时，为了读懂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从图书馆借阅过《莎士比亚词典》；在编辑和注释《鲁迅全集》（1958年版）时，又曾购买过四大卷《普希金词典》作为参考（用毕已赠送给鲁迅博物馆）。编辑著名作家词典已成为现代学术界的惯例。因此，不揣浅陋，也来编辑一部《杜甫词典》。

杜甫的诗篇历来为读者所重视，自宋以来流传更为广泛。杜诗现存 1400 多首，注释者甚多，号称“千家”。杜诗的版本也最为复杂。近人周采泉先生在《杜集书录》一书中即著录了自宋以来的各种版本两百多种，指出历代学者曾用毕生精力从事杜诗的笺注工作，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又指出：其中也有伪造故实，曲解诗意者，因此造成了一些混乱现象。在《杜甫词典》这部词典中，我力求继承并借鉴古人及今人已有的科研成果，力求避免穿凿附会之弊，力求运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让更多的读者读懂杜甫的诗篇，在普及杜诗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 二

杜甫，字子美，出生在 1200 多年前，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个杰出的诗人。公元 712 年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770 年卒于湘江岸边的舟中，经历唐代封建王朝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和代宗（李豫）四个朝代，前后共计 59 年，正是这个封建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在留给我们的 1400 多首诗中，时常忆起自己生活过的那个值得回忆的时代，他所经历过的平凡的或严峻的事件，他所接触过的令人同情的劳苦大众或令人厌恶的贪官污吏；他在诗中写下了他的欢乐、悲哀、愤怒、沉痛、悒郁和忧伤……他的诗篇经过时间的检验，是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现在尚存 1400 余首。在唐代诗人作品中，除了白居易的诗之外，杜诗是流传至今最多的。然而，白居易的诗是由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以及他本人在生前艰苦经营才

得以保存的；而杜甫的诗在他生前大部分已经散失，是在他死后才由一些爱好者陆续收集起来的。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大都出于众多读者的自觉自愿，而不是像唐代另一位诗人王维的诗集那样，是出于皇帝的旨意编成的。

对于杜诗，历代有两种编辑办法：一为分类，一为编年。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查考和进一步研究方便起见，编者按照现存可以考订的杜诗的写作年代，曾经把它们分编为十卷。《杜诗便览》和《杜诗今注》都是按照这样的办法编成的。现在，这部《杜甫词典》大体上也是按照编年顺序编写的。

杜甫早年所写的诗篇没有被保存下来。据杜甫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进雕赋表》中自述，到那时为止，已经“约千有余篇”。但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至天宝四年（745），他漫游齐、鲁、东都（洛阳）等地所作。他早年漫游吴、越或更早时候所写的诗都已散失，未至长安以前的作品，仅存《游龙门奉先寺》、《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等25首。

杜甫在天宝五年（746）至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以前，困居在唐代首都长安。现存可以确定为这一时期的作品111首。他结束漫游生活以后，满怀希望来到了长安。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便写下了一些投赠当权者的作品，诗中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生活诸多方面。同时他在敏锐的观察中也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开始觉察到在这太平盛世，已隐伏着社会危机。由于他困居长安十年期间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观察和自己的深切体会，他在“安史之乱”前夕，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著名诗篇，开始形成自称为“沉郁顿挫”的风格。

杜甫在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期间，弃官赴秦州之前的作品，现存126首。“安史之乱”在唐代历史上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杜甫的生涯和创作道路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巨大动乱的时代促使他有机会开始接近底层百姓，对于百姓生活中的疾苦有所体验和理解，并产生深切同情与忧虑，从而激发他写

下了许多即事名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特色的如“三吏”、“三别”一类的诗篇。

杜甫在乾元二年(759)七月至十二月，自华州(今陕西华县)赴秦州，后又同谷(今甘肃成县)暂住，以后便转往成都。杜甫在秦州时以及由陇入蜀，未至成都之前所写的诗现存 120 首。杜甫在秦州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当这种生活也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他又不得不由陇入蜀另谋生路。他在这一段穷困潦倒、凄惶不定的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纪行诗和咏物诗，其中不少是借描写山川形势和自然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这是以前的杜诗中未曾见过的。后人甚至称之为“图经”。

上元元年(760)至宝应元年(762)，杜甫入蜀后居住成都草堂。这在杜甫一生中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暂时安稳的时期，现存这时期的诗篇 178 首诗。他到了成都以后，在众多友人帮助之下，在浣花溪畔，经过多方面艰苦经营，修建了一座草堂。他和他的家人得有一个安身之所。远离战争烽火，得到暂时的宁静。这时在他的诗中，出现了描绘宜人景色，抒写宁静心情的绝句和律诗。

宝应元年的春天和夏天，杜甫是在成都度过的。这年七月，他的好友严武奉诏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今四川广元)。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发动兵变，杜甫不得不去梓州(今四川三台)避难。直至广德二年(764)三月，杜甫得知严武将再次入蜀，他又急返成都。这一时期他往来于梓州和阆州(今四川南充)所作诗现存 177 首。

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765)，杜甫复归成都时所作诗现存 90 首，大都是反映在剑南节度使幕中任职时的情况。这时他已届暮年，希望有一个比较宁静的生活，然而早出晚归的幕僚生活，却使他感到苦恼。但即使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长久维持下去。永泰元年，严武逝世，杜甫失去了依托，不得不携家南下，又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766)，杜甫离开成都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市忠县)至云安(今重庆市云安)。在这一短暂的旅途中，杜甫作诗不多，现存 43 首。

当他抵达云安时，即因病不得不停留在这里，旅途中的耳闻目睹，使他深感到人民的灾难是深重的。

大历元年至三年(766~768)，杜甫由云安移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在夔州所作诗现存 437 首，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在夔州，他先住在城外山间，后移居西阁，又移居赤甲、瀼西、东屯等地。他对于峡中山川形势，节物风光，都深有感受，并着力加以描写。他虽置身于地方官吏之间，而在实际生活上则更接近于底层贫苦人民。由于身体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他深感年老体衰，对于参与世事已无能为力。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中，他经常回忆往事，从自己所经历的政治生涯中，所接触的人物和事件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但是深刻的，而且是亲切感人的。

杜甫在大历三年至五年(768~770)由夔州出三峡，漂泊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公安(今湖北公安)、岳州(今湖南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等地。杜甫出峡以后，直到逝世之前所写的诗，现存 152 首。一生都满怀忧国忧民深情的诗人杜甫，最后无家可归，竟客死在湘江岸边的舟中！朝廷对他如此冷酷无情，而他却仍未忘却对于这一个封建帝国的兴衰，还要负起一部分道义上的责任；对于深重灾难中的人民仍未忘情，在精神丝缕上还要分担他们的忧患，最终竟在流离转徙的生活中结束了他的悲惨一生。然而，他的光辉的不朽的诗篇，却永远留在人间！

### 三

从上面的简介当中，我们大略可以知道：杜甫的诗篇确实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把杜甫及其诗篇普及到广大的读者中间去，确实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将起到它的应有的作用。然而，杜甫何以伟大？杜诗何以感人？自唐以来，却经常出现不同的评价，在此我们不妨作一些历史性的考察。

根据现有资料，第一个给予杜甫及其诗篇以崇高评价的是在杜

甫之后的唐代诗人元稹。元稹接受杜甫之孙杜嗣业的委托,为杜甫作了一篇《墓系铭》。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他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三百篇”说起,并对汉、魏、六朝的众多诗人的诗作,直到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的作品,都有所评论,然后谈到杜甫和他的诗篇。他说: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秣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公允的对杜甫及其诗篇的评价。

元稹对于杜甫的创新精神特别注意。他对于杜诗中那一些从汉、魏、六朝乐府诗而来的即事名篇尤为重视。他在《乐府古题序》中,更着重指出:“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认为:杜甫的即事名篇的创作,对于他以及他的朋友白居易、李绅等人创作“新乐府”,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他在《乐府古题序》中,又写道:“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

元稹对于杜甫及其诗篇的评论,最早也较公允地确立了杜甫在

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这可以说不仅止于文学史上的,甚至至于整个文化史上的地位。

元稹在评论杜诗时,曾经涉及的李(白)、杜(甫)优劣的问题,这也引起当时以及后来的不少评论家的关注。他对于杜甫及其诗篇的评价,更得到后人的重视。《旧唐书》作者刘昫在杜甫的《本传》中,即同意元稹的观点,认为:“自后属文者,以稹为是。”《新唐书》作者宋祁在杜甫的《本传》中,也引用了元稹的意见并给予杜诗更高的评价,认为:“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诗歌,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宋祁也认为: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评论杜甫和他的诗篇时,把李白和杜甫并列,是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

与元稹生活在同一时代,文学主张相同,作诗风格相近,以“元、白”并称的唐代另一个诗人白居易,他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诗中,对于李白和杜甫以及他们的诗篇,也作出公允的评价。“翰林(李白)江左日,员外(杜甫)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他认为李白、杜甫应该并列,各有千秋,都应得到重视,他们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

可是在宋代却出现了由杨億、刘筠、钱惟演等人有意贬低杜甫和他的诗篇的情况。他们把自己互相酬唱的诗歌编为《西昆酬唱集》,形成所谓“西昆体”。他们提倡学习李商隐,但并没有学到李诗的优点,只是摘取李诗字句,而把杜甫视为“村夫子”。然而,这样的评价杜甫及其诗篇的人极少,得不到众多读者的同意,并没有广泛流传开去,与之相反,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这就是当时在朝为官的人或暂时离开官位仍念念不忘于仕进之途的士大夫及一部分读书人中间流传的一种观念。这可以苏轼的看法为代表。他在政治生涯上虽然经历了若干重大变化,时起时落,或出或处,但仍不失为宋代一个杰出的、有思想、有成就的政治家与诗人,他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一文中，曾这样评论杜甫及其诗篇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苏轼的这一评论，对于评价杜甫及其诗篇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自宋以来，即为许多人，特别是念念不忘仕途的人们所欣赏。

对于杜诗作出高度评价的，还有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黄庭坚是与苏轼并称的诗人，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是比较接近的。黄庭坚对于杜诗曾经提出过所谓“无一字无来处”的意见，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其二）中，论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

黄庭坚的意见，曾经得到不少评论家的赞同。在宋代及其以后，特别是专为杜诗笺注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阐释和发挥，都曾受到黄庭坚的一些影响。但也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例如，宋代大诗人陆游就曾反对这种意见。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中，说：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从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今古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

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陆游的意见是对的。他对于杜甫及其诗篇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论是“一饭未尝忘君”，或者是“无一字无来处”，都不足以充分说明杜甫及其诗篇客观存在的重大意义。

宋代抗金将领李纲在绍兴四年(1134)所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

盖自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李纲对于杜诗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以切身体验，深刻地说出了杜诗之所以感人及其必将起到的应有的作用。

宋代伟大的爱国者及诗人文天祥在敌人的狱中，曾集录杜甫诗句为诗，在《集杜诗自序》中，这样写道：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入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词，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

文天祥的评论，对于杜诗可作为“诗史”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以切身的体验，沉痛地说出了杜甫及其诗篇之所以感人之处以及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请看他的《读杜诗》：“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听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耒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他对杜甫的坎坷

命运深表同情。这首渗透真情的诗，读来感人肺腑。

#### 四

对于杜甫及其诗篇的评论，自宋以来逐渐增多，大约也是从宋朝开始，即有专人从事有关杜诗的收集、整理、编年、注释等工作。据《旧唐书》杜甫本传记载，他有文集 60 卷。《新唐书·艺文志》也载有杜甫集 60 卷，又小集 6 卷（润州刺史樊晃集）。杜甫作品在新、旧唐书虽有著录，但在当时却为人们所罕见，据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记载，这部“小集”仅“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这是残缺不全的。当时人们还知道他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但因“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对于这部 60 卷的文集，不但当时没有被保存下来，后来也没有人去收做收集工作，终致散失，这是很可惜的！

第一个把杜诗编为比较完整的集子并流传至今的是宋人王洙（原叔）。从他在宋宝元二年（1039）所写的序中，我们得知他从皇家“秘府旧藏”到民间“通人家所有”，把这些“亡逸之余”的作品，搜集起来，共得杜诗 99 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行居之次，与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王洙编辑的这部《杜工部集》，在当时可以说是比较完备的一部。

王洙编完此书之后 20 年，在宋嘉祐四年（1059）又由王琪、何瑒、丁修等人作进一步编辑加工“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天下士人所得者，悉编入之……于是杜诗无遗矣”（王琪：《杜工部集后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杜诗最早的本子。

这部《杜工部集》是否就很完备了呢？当然不是。据王洙、王琪等人的意见，即在当时仍然还有许多收集工作要做。今天看来，它是

很不完备的。历代的研究家大都认为：这个本子只是比较完备而已；与“王洙本”同时，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版本，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因此，这个“王洙本”就被视为以后各种版本的“祖本”，直至今日。

这个“王洙本”出现后，大受读者欢迎，据说曾经行销上万部。但流传到明代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时即已经有些残缺了。该书从汲古阁散出以后，曾有一个补钞本辗转递归潘氏滂喜斋，现存上海图书馆。195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印过一次，影印时又用北京图书馆所藏钱遵王述古堂另一影钞宋本，补充上海图书馆藏本，这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比较完备的“王洙本”。

稍后于“王洙本”的有宋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的“吴若本”。清钱谦益笺注杜诗，即用这个本子作为底本。除了“吴若本”之外，仅见于著录而没有流传下来的尚有其他版本。从这时起，对于杜诗进行编辑校勘加工整理的人逐渐多起来，于是便有“集注本”出现。先有“十家”，后有“二十家”、“六十家”、“百家”，以至于号称“千家”，就“全集本”来说，较为著名的也不下二三十家，《九家集注》和《草堂诗笺》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这些注释本，特别是“集注本”，对于阅读和理解杜诗都是大有帮助的。除去少数故弄玄虚、穿凿附会、歪曲历史事实真相者以外，多数热爱杜诗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笺注工作中，大都“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力求把杜诗准确地介绍给广大读者，这些工作都是很有价值的。

元代和明代对于杜诗的研究工作，多偏重于评点方面，但也偶有独特的见解；到了清代，笺注杜诗的工作蔚然成风。钱(谦益)笺、朱(鹤龄)注、浦(起龙)注、杨(伦)注，更为流行。在他们的笺注中，对于杜诗涉及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对于唐代历史、地理、职官、文物制度方面的考证；对于杜诗中有关经史子集以及佛经道藏典故的征引，也加以笺释，并纠正前人注释中的若干谬误，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他们对于历代杜诗的解说、评论、征引、诠释等方面，删芟芜杂，廓清

迷雾，提出了不少创见，更为初学者提供了阅读上的方便，促使读者得到许多启发。特别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更可以说是集杜诗注释的大成。他对于杜诗的编年工作尤为突出，虽然也有一些臆测，但大体上是合情合理的。这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杜诗给予了更多的启发和具体的帮助。

上述这一些对于杜诗的收集、整理、编校、笺注等工作，对于我们一些心仪杜诗的后来者，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爱国的伟大诗人杜甫和他的不朽诗篇都是有益的。但在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首先，我们应该继承他们的有益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比较诸家注释的异同，取其简明扼要而又精确者，去其迂腐、浅陋、冗杂者，特别是要避免受一些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仿造故实之作的的影响。力求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这样做对于理解杜诗则是更为有益的。

## 五

上述历代诸家对于杜诗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虽然很有价值，对于我们颇多教益，然而，这些成果在今天看来不免都带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自宋以来，众多评论家、广大的笺注家，其中也有某些专家学者，力求以苏轼所说的“一饭未尝忘君”的思想，和黄庭坚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的艺术特点，来说明杜甫之所以伟大和杜诗之所以感人，这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很不够的。这不足以说明，更不能够论证“杜甫何以伟大”和“杜诗何以感人”这样的复杂问题。对此，我们似可继续进行讨论。

“一饭未尝忘君”，历代评论家多以此说明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这自然是有根据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就曾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杜甫之所以伟大，绝不止于“一饭未尝忘君”的思想。作为一个生于封建时代而又属于封建统治阶

级的诗人，“忠君爱国”应是一般正常的情况。他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忠于这个国家及其最高的统治者——君主，这是一般的封建道德观念。出自“奉儒守官”家庭的诗人杜甫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诗人，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时候，由忧国忧民进而爱国爱民，这更是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应该具有的品格。“爱国”、“爱民”和“忠君”并不矛盾。他希望能有贤明的君主出现，致使国泰民安，这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情况。从这一情况来看，众多评论家所说的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杜甫在诗中又曾说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他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逐渐衰败下去但自己又无力挽回的时候，“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他所想到的，所忧虑的，所深切关怀的，就不仅止于一个当今的皇上，他的思想状况很自然地就不仅是“忠君”所能概括了的。曾经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并充满希望入朝为官的诗人杜甫，对于当朝皇帝李隆基是怀有好感的，期望他能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但在经历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之后，又面临各地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目睹广大平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时，他对于无力改变这种状况的昏庸的李亨，就未免失望了，终于弃官而去。当更加懦弱无能的李豫在位时（李豫曾经召他回朝，充任京兆功曹），他也没有回朝。事实上他和深受灾难的人民共同着命运。这一特点反映在大部分的杜诗中，就成为最具有特色和最深切感人的地方。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一文中称杜甫为“情圣”，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我认为工部（指杜甫——引用者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的表达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情圣。”（《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

在争取中国人民民主的斗争中，拍案而起的闻一多，曾作《杜甫》

一文，又称杜甫为“诗圣”。认为以他的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天才，堪称“诗中之圣”，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并赞誉杜诗“信手弹去，都是绝调”（《新月》第1卷第6期。后收入《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145页）。闻先生对于杜甫及其诗篇更表示高度赞扬。杜甫诗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

被誉为“情圣”或“诗圣”的杜甫及其诗篇与他的前辈诗人及其作品当然是有联系的。这主要是继承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而不仅仅在遣词造句上面。杜甫对于前辈诗人的作品，对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传统是抱着尊敬和学习的态度的。“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又云：“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十二首》其五）。又云：“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他多次说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甘苦与心得。他吸收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众多作家作品的优点。前引元稹在他的文章中曾加以概括，元稹对于杜甫和前人之间的继承关系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

杜甫的诗篇之所以在艺术上达到如此辉煌的高度，不仅是由于他虚心学习前辈诗人的创作经验，汲取他们作品中的精华。同时也尊重他的同时代人，“不薄今人”并向今人学习创作经验。他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在《赠毕四曜》诗中写道：“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在《寄高适岑参》诗中曾写道：“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在《寄范邈吴郁》诗中写道：“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他的好友苏源明死后，他叹息说：“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对于当时和他政治主张与思想感情更加接近的诗人，尤为重视，并寄予更大的希望。他对于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更加高度赞赏，认为：“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今盗贼未息，